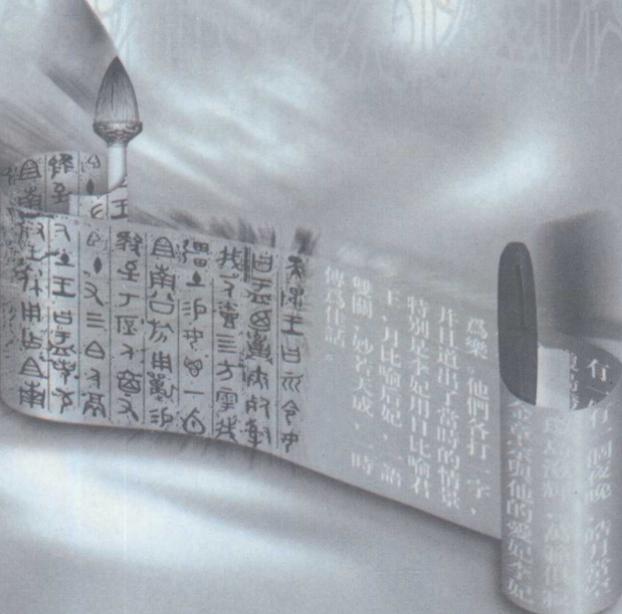


从古文到白话

——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

连燕堂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从古文到白话

——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

连燕堂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翀

封面设计:多伶平面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古文到白话/连燕堂著,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4

ISBN 7-81056-265-7

I . 从… II . 连… III . ①古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近代 ②

白话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 I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723 号

从古文到白话——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子邮件(E-mail):nckpm@public.bta.net.cn

电话:68472815 68932751 传真:68932447

印刷者: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625 字数:20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56-265-7/I·27

印 数:2000 册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获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从《古文到白话》一书是连燕堂先生依据其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长期积累，在对此一时期重要作家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的。该书对晚清“文界革命”的过程、发生其间的文体流变作出了清晰的梳理，与较为完整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杨义

专家推荐意见

连燕堂先生凭藉其多年的研究积累，在本书中以对一批重要作家及其文字的研究，对发生于近代的文体流变提供了清晰、完整的描述，对有关作者在由文言到白话的文体演变中的过渡性地位与有关贡献，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集中论述晚清“文界革命”的专著，前此似尚未见，因而本书具有总结性。

著者将其研究对象置诸前五四时期文体演变过程中，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点议论精彩迭见，判断确当，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连燕堂先生学风谨严、扎实，全书材料丰富、翔实，文笔洗炼而流畅。

近代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先导，有其特殊的文学史地位。连燕堂先生在本书中，经由对大量文学史材料的梳理，对近代“文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由多方面作了探讨。本书对于研究五四文学革命，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园

连燕堂先生以 20 年的学识积累，殚精竭虑，切磋琢磨，精雕细刻，数易其稿，终成这部不但填补学术空白，还颇具创新意义的专著。

作者以 24 万言的篇幅，钩稽从文言到白话，即从晚清到“五四”的文界革命和文体之变迁的历史，条分缕析，要言不烦，眉目清晰，路径显然。

专著史料丰富翔实，论证严密准确。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又说的是自己的话，阐述的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的鲜明观点。

全书处处讲辩证，忌片面。如第三章“文界革命之异军”，对严复、林纾、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既在政治上思想上讲他们是怎么由革命派走到复古派的，又在文体上充分肯定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反之，在第四章“文界革命之发展”，对邹容等先烈，除对《革命军》等的意旨大加肯定之外，又如实指出其文承袭了梁启超新文体冗赘复沓的毛病；且多处以空洞的口号代替严密的论证，言之无物，不切实际，徒惹人厌，遗患后来。难得的是臧否得当，恰到好处，实事求是，不发空论，不弄玄虚，实实在在，切实可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大明

目 录

探路和铺路——本书概要和概说	(1)
第一章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和新文体	(16)
第一节 梁启超的生平与思想	(18)
第二节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	(23)
第三节 梁启超新体文的思想内容	(39)
第四节 梁启超新文体的艺术特色	(56)
第二章 文界革命之先导	(71)
第一节 康有为的早期散文	(73)
第二节 谭嗣同的《仁学》和报章体散文	(86)
第三节 唐才常和樊锥的报章体散文	(94)
第三章 文界革命之异军	(106)
第一节 主张先秦文体之严复	(107)
第二节 坚守古文阵地的林纾	(117)
第三节 提倡魏晋风格之章太炎	(134)
第四节 崇尚骈文的刘师培	(148)
第四章 文界革命之发展	(162)
第一节 邹容和《革命军》	(163)
第二节 陈天华的通俗宣传	(176)
第三节 女革命宣传家秋瑾	(189)
第四节 年轻气锐的柳亚子	(199)
第五章 新体文之拓展	(213)
第一节 章士钊之逻辑文	(213)
第二节 黄远庸的政论和通讯	(229)

第三节	于右任的杂文	(252)
第六章 文界革命之分支			
——	早期白话文运动	(268)
第一节	早期的白话文理论	(269)
第二节	早期白话报刊和白话作者	(279)
第三节	对早期白话文运动的评价	(290)

探路和铺路

——本书概要和概说

我们现在写文章,办事情,乃至公私交往,政府文件,用的都是白话,基本上做到了言文一致,大家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一百多年前,社会通行的却是古文,实际上是言文分离。这种文体,除专门古籍以外,在现在的大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都有选文,学生们普遍觉得难学,甚至视为畏途,那么它给当时社会带来的不便也就可想而知了。以其与今文比较,变化之大更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今天能够实现前人“我手写我口”的理想,这当然要拜八十多年前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赐。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大张旗鼓地倡导白话文学,终于使白话能够取文言的统治地位而代之。不过,这种变化也不是突然发生、朝夕而成的,它是通过几代人艰苦探索和努力奋斗才得以实现的。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前,还有一次晚清文学革命运动(包括早期白话文运动),在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也经过了新文体这个过渡阶段,前者为后者做了探路和铺路的工作。本书将探讨这个过渡阶段中文体变革的一般情况,介绍一些对文体变革有较大影响的作家以及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

(一)

本书将以梁启超讲起。因为他是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和实际上的领导者,又是以报章需要为基础、以平易畅达为核心的 new 体的确立者。

笔者认为,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化是经过两次文学革

命运动才得以实现的，即晚清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二者都是资产阶级觉醒和革命时代的产物。当然二者有层次上即深度和广度上的不同，后者胜于前者；但是也不可否认，前者为后者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教训，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等，是对于封建旧文学的一场全面的革命。本书限于体例，只述文界革命。

1899—1902年间，梁启超多次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大意是说，要想“觉天下”，即“灌输常识”，“开通民智”，养育“民德”，培植“民力”，把国民动员起来，改革政治，完成救国御侮的大业，舍弃文字的宣传鼓动是不行的。但是旧的文章体制和语言形式已经不能适用，必须加以改革，来一场“革命”，使之“别开一生面”。在内容上，要“播文明思想于国民”，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以欧西文思”入之；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是作者学有心得，而不能满足于作个卖弄空洞词藻的旧时代的文人。在形式上，为扩大宣传效果，使大多数人能看懂，则要求“雄放隽快”、“条理细备”、“词笔锐达”，通俗流畅，而“不必求工”。

为了实现文界革命的理想，梁启超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和历史遗存的各种无用的、反动的、封建的文章和著作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尖锐地批评低级趣味、无所取义的文章；他猛烈地抨击蒙蔽群众、阻碍进步的著作；他对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文体尤施攻击，不遗余力。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著作、文章无不独尊儒教，而“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于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破坏”孔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7页）于是他对孔学及由孔学派生的政术、道德、思想、学问、社会风习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不仅为当时

的社会变革(包括文学变革)清扫了障碍,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开启了先河。他们对于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全力进攻,并最终打破了这件文化障碍物,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梁启超认为这是近代史上历史进化的一件大事,胡适在论述新文学运动时也说:“这个科举的制度,延长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寿命”。“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倒”。“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在清算旧文体种种弊病的同时,梁启超还号召“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即建立一种适应现实需要的、合于报章之用的新文体。新文体首先要有新思想、新精神。他要求报刊文章要“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他主张在“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前提下,“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古人之奴隶”,“我物我格”,“我理我穷”,“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这种文章不以一朝一姓或少数人的利益为目的,而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不以卫道翼教为宗旨,而要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和精神文明;不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而是为救国新民、改造社会、推行民主政治服务;不受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而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自由地讨论问题;不是华而不实,无病呻吟,而是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他虽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标举“三大主义”,明确地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但是推倒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的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自由活泼的新文学的理想,他已经初步地提出来了。

至于他用新文体所作的输入西学的理论鼓吹和实际建树,对于当时社会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们只需看胡适的一段话就够了,胡适在《我的信仰》中说:“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

士、笛卡儿、卢骚、宾坦、康德、达尔文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连续发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认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对于欧洲人所具有的许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显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私人权利观念与热心防其被侵，爱自由，自治能力，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给了我，也就好象开给了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鼓吹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民主，注重改造国民性等，他们的理论武器固然直接来源于西方，而他们所受的启蒙教育则不能不追溯到梁启超（当然还有别的先行者）。这种启蒙教育的作用不应低估。

梁启超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新文体这种雅俗共赏、适合于用的新的文章形式。这种新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且“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它打破了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了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是中国文体的一次空前的带有革命性的解放，并且成为后来新文学运动中文体变革的先导，所以钱玄同在寄信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时才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寄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他所提出的八事，除第七条“不讲对仗”是专讲韵文以外，其他七条：“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胡适认为古人所设譬喻、成语、引史事、引古人作比、引古人之语等不算

用典。)、“不避俗字俗语”，新文体在文言的范围内都大体上做到了。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虽然也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想，但是还没有到强调“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的高度。不过在从古文到白话的过渡中，新文体发挥了融合古今的重大作用。新文学运动初期，倡导者们笼统地提倡白话文，使人误认为白话文只是民间的口语，所以引来林纾“引车卖浆者流”都可以做北大教授之讥。后来他们才逐步明确地指出：“今日的白话文，不过要使文字接近白话。实际上农牧之白话文接近农牧之言，士大夫之白话文接近士大夫之言；并不是要人人的白话文都做得与农牧的说话一样。”（擎黄《告恐怖白话文的人们》）也有人认为文言和白话各有优缺点，应当互相吸纳：“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而新文体（包括后来的革命派和民国初年黄远庸等使用的新文体），正是一方面为了通俗而吸收了部分白话，一方面又因其广泛传播而把部分文言带进了白话。直至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书面语言（文学语言）乃至在正式场合使用的口头语言（报告、演讲、讲学等），也都包含着某些有用的文言语汇。这中间，不能不说有着新文体的巨大功劳。

新文体在向白话文过渡中另一个巨大功劳是吸收并消化了大量外来词语（主要来自日本），当时被称作“新名词”。这类词语究竟有多少，不知是否有人作过全面的统计，我们仅从当时的反对者那里就可以摘出以下各条：以太、脑筋、中心、起点、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成绩、血轮、灵魂、黄种、白种、四万万人、手段、手续、取消、取缔、打消、打击、崇拜、社会、价值、绝对、唯一、要素、经济、人格、谈判、运动、双方等等。（参见本书第一

章第四节)这些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有些是古汉语原有的,但其内涵已与原来不同,(如共和、经济等)已经成为新学说的载体,于是在输入新名词的同时也输入了新学。新名词被社会所接受,也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常识水平。新名词通过新文体而进入社会,变成口语,也是言文合一的一种途径。就拿上述那些被攻击者认为“不雅”或“与吾中国训诂不相通晓”的词组来说,除个别的已被淘汰外,绝大多数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口语和文字中广泛应用,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它们是外来语。

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来说,新文体还有两个附带的作用,一方面因为它易懂,读报的人多了,便使国民的阅读程度、文化程度和思想水平得到提高,也便使新文学运动的推行有了广大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因为它易学,有许多青年人仿效,这便“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郑振铎《梁任公先生》)我们注意到,新文学运动初期讨论文学革命的几篇重要文章都是用新文体(当然已有所进化)写成的。假如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唐宋古文、桐城派古文,或者骈文、八股文,就不会有这种“肆笔自如、畅所欲言”的文字出现,新文学运动自然就更无从论起了。

(二)

当然,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和新文体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学自身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议论文,洋务运动时期以冯桂芬、王韬为代表的以宣传改良为宗旨的报章体等,都为文体变革做了有益的尝试,并给梁启超等以很大的影响。到中日甲午战役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觉醒,并要求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试图以思想启蒙推动政治运动,从而使文字宣传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这就不仅要求文章有新内

容，而且要求打破一切不利于承载新内容的形式束缚。所以在维新运动时期，文界革命的思想便已在酝酿之中，而以思想启蒙为旨归、以合于报章之用为前提的新文体也已在试验之中了。这个初期试验的领路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既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他的上清帝七书及许多奏折，进呈清帝介绍外国政治各书的序，以及《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保国会序》、《保国会第一集演说》等等，是当时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文章。

他是思想革新者之前驱，“而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桐城义法，至有为乃残坏无余。恣纵不傥，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昉”。（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谭嗣同是维新运动期间的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的《仁学》，号召冲决一切网罗，隐寓种族革命思想，“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及对后来的革命派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为文，则“每思一义，理奥例赜，坌涌奔腾，际笔来会，急不暇择，修词易刺，止期直达所见，文词亦自不欲求工”。（《仁学·自序》）与梁启超的“纵笔所至不检束”实为同一理路。

谭嗣同还是第一个明确提倡报章文体的维新派人士，撰有《报章文体说》。他的同学和战友唐才常是他的积极支持者，其《湘报序》论述了报刊的重大作用，同时指出报刊文章应当“义求平实，力戒游谈”，“亦以使圆颅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他们用这种报章文体发表了大量鼓吹变法、号召救国、批判专制、宣扬民权的文章，思想之急进、文词之泼辣超过康梁。这不仅形成了一支维新派宣传大军的湖南纵队，而且对文界革命的产生和新文体的成立都有积极的作用。

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主要活动时期都在文界革命口

号提出之前,但他们都是文体变革的积极探索者,所以笔者称其为文界革命之先导。

(三)

凡是一种运动,都是由其作为主导思想的时代思潮促成的。晚清的时代思潮主要是反帝反封、救国强国、开化民智、传播西学等,并且由维新发展到革命。这种思潮必须通过文字宣传普及于民众,而旧的文章体制之不适用于用,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只要你投身到这个社会之中,企图做些鼓动时代思潮的工作,就不能不同时进行文体变革,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有些人理论上偏爱古文,表面上不同意文界革命的口号,鄙视或反对新文体,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也不能不向“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检束”的大势靠拢,而进行着“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

严复的译书,向中国人们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和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主张译精理微言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但是并不能坚持始终,也用较为通俗的前人翻译佛书的体裁翻译了《名学浅说》。他 1914 年翻译的《中国教育议》更直用报章文体,就是说,他事实上已经承认报章文体也可以用来译书了。再者,即使那些“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译作,也是“名词句调皆出独创。译名如‘物竞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
(张嘉森《最近之五十年》)

林纾是一个最顽固的古文家,为了“力延古文之一线”,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进行了一场“残酷”的论战。但是他与人合译的 180 余种外国小说,用的却不是古文, (“古文”与一般文言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发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小说就翻译不成,所以他不得不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等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章杂志文体。总之,“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